

热河沦陷真相

近段时间,电视剧《打狗棍》热播,其中有一段承德沦陷的情节。电视剧是艺术创作,而非历史再现。当年亲临承德采访的上海《新闻报》记者陆治先生和与张学良来往密切的胡适先生对此都有记载。

1933年2月,日军侵占山海关。13日,时任国民政府代理行政院长的宋子文向新闻界宣布:“日军如侵入承德,中央政府决定全力抵抗。”16日,承德后援会成立,推选朱庆澜、胡适、熊希龄等人为理事。17日,日本关东军司令武藤下令进攻承德;同日宋子文偕军事委员会副委员长张学良等赴承德劳军。18日,热河省主席汤玉麟、当地驻军四十一军军长孙殿英举行盛大欢宴,宾主双方都慷慨陈词,表示抗战决心,汤玉麟还发出通电,报告承德战事爆发,呼吁全国支援。

在实际行动方面,军事委员会北平分会将华北部队分编为两个集团军:第一集团军总司令由张学良亲自担任,副司令为万福麟;第二集团军总司令为张作相,副司令为汤玉麟,汤本人还兼任热河前敌总指挥。从这些现象上看,国人对热河抗战都充满了信心,一是认为热河局部抗战一定会成为事实;二是认为承

德至少不会成为第二个“九·一八事变”中不抵抗的沈阳。

但事实恰恰是比沈阳更糟。

承德沦陷的三个原因

首先汤玉麟无心抗战,一边对外慷慨激昂;一边消极应付,时刻做着逃跑的准备。

陆治回忆说,他是2月28日下午四时,搭乘北平承德后援会运送弹药的卡车赶到承德的,第二天上午10点即到省政府去采访汤玉麟,没想到门房告诉他:“汤大帅每天下午二时起床,三时会客。”

3月2日上午,陆治看到汤玉麟积攒了800箱汽油用于逃跑,却不允许用来往前线输送给养。下午两点半,陆治陪同路透社记者约克等一起去采访汤玉麟。汤先把秘书给他准备的稿子念一遍,然后说:“我汤某身为军人,对国家只知守土安民。如日军进攻,唯有奋起抵抗,尽我天职。”看汤夸夸其谈,陆治先生请汤明天派辆车送他们到前线看看。因当日上午陆治要到前线被运输处以没汽油拒绝,此时带有反激的意味。没想到,汤玉麟满口应诺:“明天,我也要到前线去看看,你们明天上午10时来,我们一起出发。”

其实,当天上午他就做好逃跑准备了,而就在采访后不久,他就带着历年来的金银财宝和大量烟土逃离了承德。

其次军纪极差,毫无抗战信念。陆治曾到街上吃午餐,看见邻座三个下级军官,穿得破破烂烂,一边数着钞票,一边破口骂人。一听,原来汤玉麟的部队已经16个月没有发军饷,现在要打仗了,才给每个士兵发了20元、每个军官发了60元的热河省兴业银行的钞票。在当地,一块银元可兑换这种钞票72元,也就是说,这种钞票根本不值钱。因此,这支军队军纪极坏,军官做着烟土生意,一般士兵只好靠抢劫为生。

其三,承德当地老百姓打心眼里痛恨这支军队。3月2日晚上,胡适和丁文江等人到张学良家吃饭。张学良无奈对胡适等人说,南凌已失守了。人民痛恨汤玉麟的虐政,不肯与军队合作,甚至危害军队,此次他派出的丁春喜部队,刚入热河境内,即有两个营长不知下落,大概是被人民“做”了。同时请胡适以及后援会派人去向人民做点宣传工作。

胡适对张学良说,滦东人民受的痛苦,使他们盼望日本人来,人心已去,若不设法收回人心,什么仗都不能打。我们

说的是空话,人民受的苦痛是事实。最好是你自己到承德去,把汤玉麟杀了或免职了,人民自然会信任你是真心救国。张学良当时只有叹气。

“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3月7日,当得知承德已失时,胡适记道:“今日下午三时,在后援会得知日兵已入承德,汤玉麟不知下落,人民欢迎敌军。自朝阳到承德凡二百英里,日兵孤军深入,真如入无人之境。”当天,胡适怀着极恶的心绪开始写《全国震惊以后》一文,文中胡适痛批东北军的贪污堕落,地方政府的贪污腐败,并指斥此次热河丢失张学良要负绝大责任,国民政府也要负绝大责任。

3月10日,张学良辞职。13日,胡适等人见到为此事北上的蒋介石,蒋介石无奈地说:实不料日本攻热河能如此神速。原来估计此仗日本须用六师团人,为此国内和台湾均须动员,“我每日有情报,知道日本没有动员,故料日本所传攻承德不过是虚张吓人而已。不料日本知道汤玉麟、张学良的军队比我们知道清楚得多了”。听了蒋介石的话,胡适以一种少有的轻蔑与慨慨评价道:“这真是可怜的自供状!误国如此,真不可恕。”

《人民政协报》2013.11.21 文/李传玺



任伯年自幼就显现出绘画天赋。据说,有一次父亲外出,家里来了一位陌生客人,10岁的任伯年接待了他。父亲回来时,问客人是谁,任伯年就拿纸画了那人的相貌。父亲一看,顿时明白是谁了。

16岁时,父亲病故,任伯年无奈之下到上海学做生意。为谋食,他画了不少折扇,临摹的是任渭长的题款,摆放在地摊上销售。这天,走来了一个身穿长衫的30多岁男子,端详良久,问他:“这扇面是谁画的?”任伯年答道:“是任渭长所画。”“任渭长是你什么人?”“是我爷叔。”“你认识这个爷叔吗?”任伯年一听,顿感不妙,忙说:“咳,两角钱哪里买得到真的任渭长扇

面?”那人笑了:“告诉你吧,我就是任渭长!”任伯年十分羞愧。

任渭长从扇面赝作看出了任伯年的才华,主动提出让他跟自己学画,任伯年的艺术生涯从此有了良好的开端。

这是徐悲鸿在《任伯年评传》中讲述的一段故事。另一段故事,同样耐人寻味。学徒出身的王一亭早年习商,他所居住的地方,临近一家裱画店,所以有机会经常欣赏任伯年的作品,并静心仿制。有一次,很偶然地被任伯年看见。王一亭忙向他叙述了自己的私淑之诚。任伯年不仅不责怪他作了赝品,反而大加赞赏,还很高兴地接纳其为弟子。后来,王一亭成为近代海派画家的领袖人物之一。

师承,有时会呈现让旁人难以理解的思维逻辑。

吴昌硕30多岁才开始学画,拜任伯年为师。这天登门时,发现任伯年正在屋顶上目不转睛地看两只猫儿打架。老师二

话没说,让他画一幅画试试。吴昌硕拿起笔,随意画了几下,老师见他用笔浑厚挺拔,不同凡响,不禁拍案道:“你将来在绘画上一定能成名,你现在的笔墨功夫已经胜过我了。”

从此,吴昌硕几乎每天都要去任家请教,师生成了至交。

在以后的日子里,任伯年为吴昌硕画过不少肖像,包括《蕉荫纳凉图》《芜菁亭长图像》等。最耐人寻味的是一幅《酸寒尉像轴》(上图)。在任伯年的笔下,45岁的吴昌硕身穿朝服,拱着马蹄式的双袖,戴着没有顶带的红缨帽,葵黄色的袍子,上罩乌纱马褂。一双厚底靴支撑起一个踌躇不前的身躯。这是身任小吏的吴昌硕拜客时拱手逢迎的尴尬相。一个谨小慎微、惟恐有失的小官吏充满矛盾的心态,从画面中显露无遗。

能把学生看透的,才是真师。

《新华日报》2013.11.8 文/陈益

古人迷信的保健品

如今,各种养生保健产品可谓名目繁多、数不胜数。其实,中国古人同样重视养生保健,当然,历史上因“补品”过量导致伤身折寿甚至中毒而亡的也不鲜见。

秦汉人青睐“五色药石”

从《神农本草经》所记来看,人参在秦汉时期已被作为保健良品来消费了。而当时最高级的补品,要属以“长生不老药”为代表的所谓灵丹妙药。秦始皇嬴政曾派人率数千童男童女到东海蓬莱仙境寻访“神药”。

经考证,秦汉时期人们迷恋的不老补药都是些将丹砂、水银、铅丹等矿物质烧炼,经化学反应后所得的物质。当时最受有钱人青睐的这些“补品”,有紫水晶、硫黄、雄黄、褚石和绿松石五种矿物质,被视为“五石之精”,又称“五石人参”,通称“五色药石”。这些“大补品”实际是大毒药,成分中大都含有程度不同的有毒物质,少量服用问题不大,有时还有益处,但多了或长期服用,不仅起不到保健作用,反而伤身折寿。

魏晋人迷信“五石散”

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以药石为基本成分的这类“补品”最受欢迎。

当时最高级且最流行的是“五石散”,又名“寒食散”。据东晋人葛洪《抱朴子·内篇·金丹》所记,寒食散由丹砂、雄黄、白矾、曾青、磁石五味药物制成。鲁迅生前对此也有研究,认为五石散的基本成分是石钟乳、石硫黄、白石英、紫石英、赤石脂。

五石散的效果立竿见影,服食后身体发热,但也有很强的毒副作用,服后心中烦躁,如火烧身,因此服食五石散是有严格讲究的:必须寒衣、寒饮、寒食、寒卧,故名“寒食散”。当药力散发时,一定要宽衣大帽,出户散步,故又叫“行散”、“行药”。

唐代人热衷服食“大药”

到隋唐时代炼丹手法花样翻新,保健品种类丰富。有的用猪牙和十一月采的皂莢,烧炼取灰霜,制成名叫“莢天生牙”的保健药品。有一种叫“铅汞”的丹药,便是用童男童女的大小便烧淋取霜而成。这些丹药,唐代人俗称为“大药”。

唐朝皇帝更迷信进补“多饵丹药”。唐太宗李世民、高宗李治等,都曾召来大批炼丹道士进驻宫中,为他炼制长生大药。李治刚当上皇帝便广征天下奇人入宫,合



炼黄白仙丹。但李治嘴贪,服食过量,致急性中毒而亡。

宋元显贵盛行喝鹿血

宋元时期,以动物乳汁、血液为代表的液体补品开始流行。当时称为“饮子”,即现代所说的保健饮料。真正的有钱人、贵族中间则盛行喝鹿血。《清波杂志》中记载:“士大夫求恣嗜欲,有养巨鹿,日刺其血,和酒以饮。”有的人家甚至养了成百上千头鹿。

明清时的补药多是壮阳药

实际上,明清时的不少大补药都是壮阳药,而历代皇帝常用的“大补品”其实也多是这类东西。从孙静庵所著的《栖霞阁野乘》“圆明园内发现之房中药”来看,清朝皇室也是这样。

《老人报》文/倪方六

美前总统胡佛曾在河北打工

一张美国第31任总统——胡佛亲笔签名的清代股票在沈阳金融博物馆展出。鲜为人知的是,100多年前,24岁的胡佛曾作为美国“白领”被派往中国河北唐山的煤矿“打工”。

清代股票揭开胡佛中国往事

这件清代光绪二十七年(1901年)的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今位于河北省唐山的开滦煤矿)发出的临时股份证明书上,书面标明股金总额为一百万英镑。位于股票右下角总经理一栏的亲笔签名——HC.Hoover。

1878年,开平矿务局在直隶(今河北)唐山开平镇正式宣布成立。至十九世纪末,该局已成为年产原煤70余万吨、总资产达白银600万两的大型新式采煤企业。

而此时,在大洋彼岸的胡佛还是一个刚刚从斯坦福大学毕业的毛头小子,每天在加利福尼亚的矿坑中辛苦工作10小时,却只能挣到可怜的2美元日薪。

1897年,英国矿业巨头墨林采矿公司公开招聘具有长期找矿工作经验的地质学家,当年刚满23岁的胡佛获得了这份工作。

1899年3月,胡佛和妻子抵达天津,他们还分别给自己取了一个中文名字,胡佛名为“胡华”,他的妻子名为“胡璐”。

在华第一桶金成政治“原始资本”

1900年,义和团运动爆发。胡佛在天津的寓所附近救下后来担任北洋政府总理的唐绍仪的女儿唐梅,并伙同德国人德璀琳骗取了开平矿务局的所有权,捞到了他人生中的第一桶金。

1901年2月,胡佛被任命为英商开平矿务有限公司总经理。这张股票,就是胡佛于这个时期签发的。

不过,胡佛并没有长期在开平矿务任职,1902年带着妻子离开了中国。胡佛在中国的“打工”经历,使他成为美国人里第一个在中国发财的富翁,并利用这些资产在返回美国后继续发展,继而转战政坛,在1929年当选为美国第31任总统。

《楚天金报》2013.11.26 文/佚名